



# 紀念宋慶齡同志

廖承志題

## 紀念宋慶齡同志

\*

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

宋慶齡同志故居編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號)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印刷

(九龍土瓜灣炮仗街75號)

1982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用紙787×1092毫米 1/2開 印張17

統一書號: 7068·1094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9.00元

裝幀設計 楊亞人

責任編輯 盛永華

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

宋慶齡同志故居編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舉世聞名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宋慶齡同志。

宋慶齡，廣東省海南島文昌縣人，1893年1月27日（清光緒十八年十二月初十）誕生於上海。

# 前言

宋慶齡是舉世聞名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是保衛世界和平事業久經考驗的前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她從青年時代追隨孫中山開始獻身革命起，在近七十年的漫長歲月裏，堅強不屈地英勇戰鬥，始終堅定地和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爲人民民主革命，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爲保衛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殫精竭力，無私無畏，鞠躬盡瘁。

宋慶齡爲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在中國近現代革命史上譜寫了光輝的篇章。

宋慶齡把一生獻給人民事業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情操，足爲中華民族的一代楷模。特別是她順應時代的潮流，“跟隨歷史的脚步不斷前進，從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成爲偉大的共產主義者”，尤其難能可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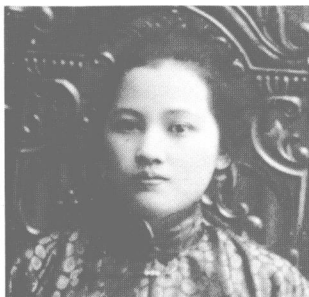
正因如此，她贏得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包括台灣同胞和海外華僑的衷心敬愛和永遠紀念，也受到了全世界各國愛好和平正義的人民的仰慕和尊敬。

## （一）

宋慶齡，廣東省文昌縣人，一八九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清光緒十八年十二月初十）誕生於上海。

她的父親宋嘉樹（耀如）青年時代曾經在美洲做工，在美國受過教育，回國後在上海任基督教牧師，後來又經營工商業。他是國內最早聆聽孫中山革命宣傳的有數人物之一。他嚮往祖國的獨立富強，同情反清革命，多次在家中接待孫中山。孫中山在被清政府誣衊爲“叛逆”的年代裏，始終是宋家言談中的英雄。宋慶齡在童年時代就見過這一位不凡的來訪者。他的爲人和革命精神，在宋慶齡幼小的心靈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非常愛戴和仰慕孫中山，深受其革命思想影響，企望以他作爲自己政治上的楷模。

宋慶齡七歲時，進入上海的新式女子學校——中西女塾讀書。她性格嫺靜、溫雅，天資聰穎，學習勤奮，特別喜愛學習英語。一九〇八年，偕宋美齡離開上海到美國留學，先入新澤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學校學習外語，準備投考大學。隨後考入佐治亞州梅肯市基督教衛理公會所辦的威斯里安女子學院文學系讀書，這所學校因爲是世界上最早得到特許而設立的



女子大學而著名。一九一三年，她畢業於該校，獲得文學士學位。

宋慶齡是一位熱情洋溢的愛國者。一九一一年，她就著文發表對中國前途問題的看法，深切關懷祖國的命運。她對孫中山領導革命，建立中華民國，用共和國取代君主專制，更感到衷心的喜悅。一九一二年，在收到她父親寄來的新國旗（五色旗）後，立即撕掉清朝的龍旗，踩在脚下，把新的旗幟掛在牆上，為共和制度的實現而歡呼。同年四月，又在威斯里安女子學院校刊上發表《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評價辛亥革命的勝利，指出：“此後四萬萬人民將無復為專制政體之奴隸，一改四千年來之桎梏，而恢復人類應有之自由平等。”

但是，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很快被反動的封建買辦勢力的代表袁世凱篡竊了。孫中山發動武裝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之後，被迫於一九一三年八月東走日本，重新組織力量，策劃“三次革命”。

這年夏季，宋慶齡結束了學生生活，滿懷革命理想到達東京。她在九月中旬見到孫中山，思想上充滿着對他的深深崇敬。據日本外務省檔案記載，在此後半個月內，她去訪問過孫中山七次。隨後便擔任孫中山的英文秘書，開始了革命的生涯。

孫中山在日本組成中華革命黨，領導反對袁世凱統治的鬥爭。但是，中華革命黨所舉行的武裝起義連續遭到失敗。宋慶齡在這艱苦歲月裏，給予孫中山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她積極地協助孫中山，擔負着整理文件、處理函電及提供資料等許多繁重緊張的工作。孫中山對她非常信賴，把通訊密碼都交給她保管，並委以某些對外聯絡工作。在革命的戰鬥工作中，兩人甚為契合。宋慶齡進一步受到孫中山高尚品德及革命精神的熏陶，提高了對中國革命各種問題的認識，大大增長了革命成功的信心；而孫中山因革命鬥爭一再失利和長期流亡而遭受的痛苦和孤寂，也從宋慶齡的支持和鼓舞中獲得了慰藉。熱愛祖國和獻身革命事業的共同志向，使他們在患難中建立了深厚的戰友情誼。

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宋慶齡力排家庭和親友的阻撓，和孫中山在東京結婚。婚後，繼續擔任秘書工作。她既是孫中山的生活伴侶，又是孫中山革命事業忠實的戰友和助手。宋慶齡漠視名利、權勢和享受，她的唯一的理想就是參加孫中山領導的“為求中國自由平等”的革命運動。為此，她寧願放棄優越的物質條件，忍受宋氏家族的責難，心甘情願地與流亡中的孫中山結合，過着艱苦、動蕩的生活，勇往直前，堅強不屈。

繼反袁之後，孫中山為維護政治民主，以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一再進行討伐北洋軍閥的鬥爭。在此期間，宋慶齡陪同孫中山往來於上海、廣

州之間，在南中國的韶關、桂林、梧州等許多地方勞苦奔波，協助孫中山聚集革命力量，從事新的鬥爭。一九一九年，她和孫中山一起，滿腔熱忱地歡迎並支持揭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序幕的五四愛國運動，一九二一年，她發動廣州婦女組織“出征軍人慰勞會”和紅十字會，並親自率領會員慰問北伐戰士，積極贊助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一九二二年，軍閥陳炯明叛變，炮轟總統府，她在危急形勢下，堅持孤身留下吸引敵人火力，讓孫中山先行離開險地。她對孫中山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以沒有你”，表現出獻身革命事業的堅強意志和卓越膽識。

一九二二年前後，孫中山於艱難頓挫中，勇敢地吸取歷次失敗的教訓，開始進行新的探索和追求。宋慶齡參與了孫中山同中國共產黨代表李大釗、林祖涵等，以及列寧所派使節馬林、達林、越飛等的商談。她參與謀議，做了大量的切實有效的工作，協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為真正的革命黨。一九二四年一月，她在廣州出席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堅決擁護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孫中山為了全國的和平統一和經濟建設問題，決定接受馮玉祥等的邀請，犯難北上，宋慶齡毅然隨行。

長期的艱苦鬥爭使孫中山積勞成疾。一九二五年初，孫中山在北京病重期間，宋慶齡在病榻前日夜護理。她接受了孫中山臨終前的遺囑和要求代替他訪問莫斯科以實現其未遂願望的囑托。三月十二日，孫中山與世長辭。宋慶齡強忍巨大的悲痛，向國內外介紹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遺囑。

## (二)

孫中山逝世後，宋慶齡堅決地為維護三大政策、貫徹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實現孫中山遺志而努力。

宋慶齡於一九二五年四月回到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她對英、日帝國主義的暴行表示極大憤慨，熱情地讚頌羣衆的愛國反帝鬥爭。她指出，“凡中國國民皆當負此救國責任”，這也就是孫中山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六月，又著文讚揚當時全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八月，反動份子在廣州殺害了孫中山的親密戰友廖仲愷，她聞訊極感悲痛和憤慨，囑告革命黨人必須“勉承先志，竭力進行”。不久，便帶病離開上海返回廣州投入戰鬥。

國民黨的右派極力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對國共合作。他們乘孫





中山逝世之機，分裂革命力量，紛紛組織小團體，羣起而鼓噪，反對三大政策，反對堅持革命的國民黨左派，攻擊共產黨人，叫嚷“清黨”。在廣東地區的國民黨右派，五月間就大造革命政府“赤化”、“共產”的謠言，與帝國主義者策劃“驅逐廣州及廣東的布爾什維克”。年底，以謝持、鄒魯爲代表的“西山會議”派，通過所謂“取消共產黨在本黨黨籍”、“開除中央執行委員之共產黨派李大釗”等提案，公然進行叛賣和分裂革命陣營的活動。面對着革命派與反革命派短兵相接的這種形勢，宋慶齡毅然挺身而出，高舉孫中山的革命旗幟，團結國民黨左派，聯合共產黨人，予國民黨右派以迎頭痛擊。她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演說，對國民黨內違背孫中山遺訓的右派集團嚴加譴責，號召革命黨人緊密合作，“團結堅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撥，不要因一二人的私見便爭意氣”，要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實現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她的原則立場，贏得了與會代表們的尊敬，以最多票數之一被選爲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這時，國民黨內披着“左派”外衣的蔣介石，也暴露出右派的面目。他在一九二六年三月，製造“中山艦事件”，逮捕共產黨人李之龍等。五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他又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案”，排擠和打擊共產黨人。宋慶齡與何香凝、柳亞子等堅決抨擊了蔣介石的反共陰謀。

同年七月，國民革命軍從廣東出師北伐，很快消滅了長江以南的軍閥勢力，掀起了全國的革命高潮。宋慶齡積極地投身到中國人民大革命的洪流中。她於十一月與國民政府先遣人員陳友仁、鮑羅廷等隨北伐軍到達武漢後，由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領袖組成“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作爲遷都前的臨時黨政最高權力機關。旋即在當地爲婦女創立了第一個政治訓練班，動員婦女參加國民革命；又同何香凝組織紅十字會，發動慰問傷兵運動和策劃戰時救濟工作；還經常參加民衆大會，宣傳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有力地配合了北伐革命戰爭。

正當革命迅猛向前發展的時候，蔣介石加緊了策劃篡奪革命領導權的反革命活動，宋慶齡嚴正地斥責蔣介石的叛變行爲。一九二七年三月間，在漢口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經過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吳玉章、林祖涵等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的努力，通過了堅持國共合作的革命原則和限制蔣介石權力的決定，並在會後發表了對全體國民黨員的訓令和對全國人民的宣言，重申國民革命的方針是要扶助農工運動，徹底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在這次大會上，宋慶齡又被選爲中央政治委員會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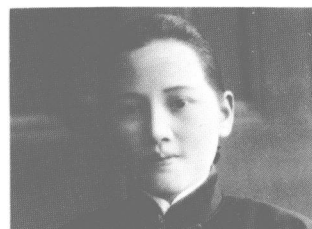
員和國民政府委員。

在武漢革命政府時期，宋慶齡爲實施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她非常珍惜蘇聯人民的友誼。她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內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動力”；也和孫中山同感，要救活國民黨“就需要新血液”，因此，同中國共產黨人緊密合作，團結無間，成爲共產黨人的親密戰友。她把工農視爲“力量的基礎”、“建設自由新中國的新柱石”，熱情地支持工農運動，堅決贊成土地革命，稍後又明確指出：“沒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誰反對土地革命，反對千千萬萬的農民獲得經濟解放，誰就站在反革命陣營那邊。”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的叛變和隨後的蔣、汪合流，把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淹沒在血泊之中。宋慶齡對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羣衆的罪行無比憤慨。她和許多國民黨左派人士以及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董必武、惲代英、林祖涵等，聯名發表了《討蔣通電》，痛斥蔣介石是“叛徒”、“敗類”、“民衆之蟊賊”，聲討其另立中央、反共反人民的叛逆罪行。在反革命的“寧、漢合流”前夕，她又在漢口發表《爲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表示了對當時中國政治的鮮明的立場，嚴正宣佈退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她說：“本黨若干執行委員對孫中山的原則和政策所作的解釋，是違背了孫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對於本黨新政策的執行，我將不再參加。”宋慶齡站在堅持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立場上，與叛徒們實行徹底決裂，同時對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前途表示了堅定的信念。在此後的長時期鬥爭中，她爲繼承和發揚孫中山的遺志，始終恪守自己的聲明，不顧國民黨反動派的威脅利誘，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堅決站在革命人民一邊。

同年八月一日，宋慶齡和毛澤東等二十二二人，以國民黨中央委員名義發表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蔣、汪集團“皆已成爲新軍閥之工具，曲解三民主義，毀棄三大政策，爲總理之罪人，國民革命之罪人”；號召革命人民繼續爲反對帝國主義和解決土地問題而奮鬥。這一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舉行了南昌起義，當時宋慶齡雖然未在南昌，但是由周恩來等二十五人組成的革命委員會，仍推選她爲委員會七人主席團的成員。

爲了尋求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宋慶齡於同年八月底離開上海出國，代表長逝的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羣衆赴莫斯科訪問。行前，又一次發表聲明，闡明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表示對孫中山革命主張的不變的忠誠。她在蘇聯訪問期間，連續發表《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衆宣言》、《對塔斯社發表的聲明》和《青年與革命》等一系列的宣言、聲明與論文，表示要繼續與中國



新舊軍閥作堅決鬥爭，努力實現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

一九二九年五月，爲參加在南京舉行的孫中山的國葬儀式，宋慶齡離開蘇聯經柏林回國。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她到歐洲德、法等國旅行。在此前後，她積極地參與了一系列國際性的反對帝國主義和保衛和平的活動。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比利時和一九二九年八月在德國召開的兩次國際反帝國主義同盟大會上，宋慶齡都被選爲大會的名譽主席。其後，她又成爲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主要領導人之一。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面臨着嚴重的民族危機。宋慶齡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痛心疾首，發表了《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一文，無情地揭露蔣介石政權的本性及它在民族危亡之際所進行的投降主義活動。她深信：“只有以羣衆爲基礎並爲羣衆服務的革命，才能粉碎軍閥、政客的權力，才能擺脫帝國主義的枷鎖，才能真正實行社會主義”。她大聲疾呼：“我不忍見孫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國民黨軍閥、政客所毀壞”，“我更不忍見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的中國，因國民黨背棄自己的主義而亡於帝國主義”。她爲抗日救國奔走呼號，不遺餘力，並決心投身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黑暗統治的鬥爭行列中去。翌年一月，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宋慶齡高度評價這一反帝愛國行動，指出：“十九路軍衛國抗戰之英勇，實爲真正之民衆武力”，他們“不特爲軍隊之模範，實爲革命之武力與反帝國主義之先鋒”。她表示要盡最大的努力參加抗日戰爭，隨即與楊銓、何香凝等積極籌劃救濟工作，創辦了一所設有三百個床位的“國民傷兵醫院”，親自擔任理事，主管醫院事務，並經常親臨病房慰問抗日戰士，鼓舞士氣。

當國民黨反動派用白色恐怖手段殘酷鎮壓革命運動的時候，宋慶齡和魯迅、蔡元培、楊銓等，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上海組織進步團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把反對蔣介石的法西斯屠殺，保衛人民正當的權利，和營救被捕革命者的鬥爭作爲自己的主要任務。在她的領導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一面積極從事營救被捕革命者的工作，一面大聲疾呼，揭露和抨擊國民黨法西斯統治。它所進行的政治鬥爭，是當時中國人民日趨高漲的民主運動的組成部份。它密切配合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反蔣鬥爭，起了積極作用。宋慶齡在國民黨反動派殘酷迫害共產黨人和愛國民主人士的黑暗歲月，以她崇高的威望和地位，通過廣泛的社會聯系，千方百計地支援、掩護和營救了許多被迫害的同志，爲革命事業作出了獨特的重大貢獻。

宋慶齡是孫中山的理想和事業的堅定繼承者，是中國共產黨的始終不

渝的親密戰友。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她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並為促成這個統一戰線而鬥爭。一九三四年四月，她與何香凝等一千七百七十九人聯名發表《中華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提出“立刻停止屠殺中國同胞的戰爭”、“一切海陸空軍立即開赴前綫對日作戰”的主張，要求發動抗日救國的民族自衛戰爭。這一號召得到全國廣大羣衆和海外華僑的熱烈響應，不久公開簽名贊成者達十萬人。當一九三五年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進一步加緊的時期，她在一九三七年二月，聯合國民黨內的愛國民主人士何香凝、馮玉祥等十三人，向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恢復孫中山先生手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認為“只有忠實執行他（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國”。力促國民黨改變立場、團結抗日，給予了當時正在高漲的全國人民的抗日運動以重要的幫助。同年春，她熱誠支持沈鈞儒、鄒韜奮等人組織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並擔任了該會的執行委員。六月，她同何香凝以及上海文化界人士十六人，共同發起爭取愛國自由的“救國入獄運動”，抗議蔣介石非法逮捕沈鈞儒等“七君子”。在其所發表的宣言中，嚴正指出：“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都要搶救這危亡的中國。我們不能因為畏罪，就不愛國，不救國。”號召全國人民“都為救國而入獄”，從此“再不能害怕敵人，再不用害怕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十一月，她又發表了《關於國共合作的聲明》，極力贊成國共第二次合作，指出：“孫中山一生主張共同奮鬥救中國。這就是他主張國共合作的原因”；今天“必須舉國上下團結一致，抵抗日本”。再次表明她積極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終於攜手抗日。這時，宋慶齡把支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軍隊作為主要工作。她邀集中外著名人士，於一九三八年六月在香港發起組織“保衛中國同盟”，致力於戰時醫藥救濟和兒童福利工作。此後四年中，一方面著文向國外和華僑宣傳抗日運動，報導中國抗日戰爭的真實情況，介紹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軍民的英勇鬥爭，讚揚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堅強意志；一方面向全世界募集醫療器械、藥品、現款及其他物資，通過各種渠道源源不斷地運往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有力地支援了人民抗日的戰鬥。她還介紹國際友人組織的醫療隊到抗日根據地參加戰時救濟工作，白求恩大夫所建立的國際和平醫院，在抗日戰爭及以後的解放戰爭中，都曾經起了十分出色的作用。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宋慶齡立即同何香凝、陳友仁等聯名通電，譴責國民黨政府的倒行逆施，嚴厲斥責蔣介石“把孫中山的



遺訓置諸腦後，破壞團結抗戰”，並嚴正指出：“今後必須絕對停止以武力攻擊共產黨，必須停止彈壓共產黨的行動”。

同年年底，在日軍侵佔香港前六小時，宋慶齡乘最後一架飛機飛往重慶。之後，她在重慶繼續開展“保衛中國同盟”的活動，還聯絡馬海德、史沫特萊、斯諾、艾黎等國際友人並肩戰鬥，對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宋慶齡處境十分艱難危險，但她不顧國民黨反動派對她的種種利誘、威脅和迫害，堅持不懈地揭露蔣介石破壞團結抗戰的陰謀，抨擊他對日投降妥協、對內反共反人民的反動政策；同時利用各種可能利用的條件，忘我地、巧妙地從事革命活動，全力支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和抗日根據地，直至抗日戰爭取得勝利。

### (三)

抗日戰爭勝利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宋慶齡自重慶回到上海。她將“保衛中國同盟”改組為“中國福利基金會”（一九五〇年八月改名為“中國福利會”），從事婦幼衛生、文化教育和社會救濟事業。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先後創辦了兒童福利站、醫院、閱覽室、識字班以及兒童劇團等機構，為勞動羣衆做了許多有益的事情。

當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援助下，重新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時，宋慶齡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及時發表《關於促成組織聯合政府並呼籲美國人民制止他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的聲明》，指出蔣介石發動內戰的反人民性質，反動份子決不能期望從這次戰爭中獲得勝利，出路只有廢除一黨專政，組織聯合政府。她堅決反對蔣介石推行的賣國、獨裁、內戰的反動政策，指出內戰“這個災難必須趁它一開始的時候就加以阻止”，而“聯合政府應當立即組織起來”；並要求美國人民制止他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這一義正詞嚴的聲明，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廣泛的震動和響應。

在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全面內戰的日子裏，宋慶齡面對着反動勢力的種種恐嚇和威脅，堅貞不渝，繼續募集了大批醫療器械、藥品及其他物資，通過中國共產黨的地下交通綫和其他途徑，運送到解放區，給予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巨大的物質支援。她為了支援解放區，和國內外反動勢力進行堅決鬥爭，揭露國民黨反動政權的殘暴和腐敗，駁斥他們對解放區的誹謗。宋慶齡把人民的革命事業當作自己的事業，以她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方式參加人民解放戰爭，為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



了不朽功績。

一九四八年一月，爲了反對蔣介石的反動統治，以李濟深、何香凝等人爲首的國民黨民主派人士，在香港組成“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宋慶齡被邀請擔任名譽主席。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宋慶齡在上海發表文章，熱烈歡呼人民的勝利已在眼前，稱中國共產黨爲“我們的領導者”，滿懷激情地“向共產黨致敬”。九月，她受中共中央邀請，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她說：“讓我們現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與富強的新中國，和全世界的人民聯合起來，實現世界的持久和平。”

由於宋慶齡對中國人民的進步事業和革命事業的卓越貢獻，她在一九四九年九月被選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二月分別當選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和一九六五年一月兩次當選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一九七五年一月和一九七八年二月，連續當選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新中國建立以後的三十多年中，她作爲國家領導人之一，進行了大量國務活動。宋慶齡曾先後出訪蘇聯、印度、緬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錫蘭等國，取得很大成功。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她曾經隨同毛澤東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她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經常共商國際國內的大事，在政治上從來同共產黨保持一致。正如劉少奇所說，宋慶齡在“歷次關鍵時刻”，“一向是支持我們黨，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貢獻甚至超過我們黨的一些負責同志。”

宋慶齡一貫關注新中國的婦女工作，熱情關懷青少年和兒童的健康成長，長期領導中國救濟總會、中國紅十字會和中國福利會的工作。她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被推選爲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今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後，在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七八年的全國婦聯第二、三屆執行委員會及中國婦女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都被選爲全國婦聯名譽主席，是中國婦女界的傑出領袖；她從一九五一年被選爲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主席後，一直擔任着這個職務，是全體中國少年兒童的慈愛的祖母；她在救危扶傷、羣衆福利方面，做了大量有益於人民的工作。

宋慶齡一九五〇年被選爲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一九五二年被選爲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聯絡委員會主席。在長期的國際活動中，她爲反對侵



略戰爭，保衛世界和平，發揚進步文化，促進社會進步和人類幸福，增進各國人民的了解和友誼，進行了不懈的工作，受到廣泛的崇敬，被國際上公認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女性。

宋慶齡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爲了祖國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生活的美滿幸福，她無私無畏，英勇戰鬥，忠貞不渝。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她緊跟着歷史的脚步不斷前進。宋慶齡從熱愛祖國開始走上革命的道路後，隨着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順應時代的潮流，她的愛國主義先是發展到革命民主主義的水平，隨後又提高到共產主義的高度，進而成長爲一位共產主義戰士。宋慶齡早在三十年代，就十分重視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且還關懷和幫助在她周圍同她一道工作的人員學習，曾爲外國友人組織過《共產黨宣言》學習小組，安排他們閱讀馬列主義著作。她早就以共產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並且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了入黨的要求。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接受宋慶齡爲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實現了她長時期以來的願望。同月十六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決定，授予宋慶齡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的榮譽稱號。

作爲一位偉大的女政治家，宋慶齡曾經發表了許多犀利的文章，對於推動中國人民的革命，維護國際的正義，保衛世界和平和反對侵略戰爭，起了很大作用。這些著述的大部份滙集在她的《爲新中國奮鬥》（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出版）和《宋慶齡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出版）兩書中。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宋慶齡以慢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不治在北京逝世。中國共產黨中央、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決定爲她舉行隆重的國葬。六月四日，骨灰安葬於上海萬國公墓。宋慶齡爲國爲民所建立的光輝業績，將永載史冊爲後人所紀念。她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將成爲激勵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鼓舞力量。

1893·1——1925·3

